

湖北当阳九里岗遗址群考古调查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九里岗遗址群位于江汉平原西部边缘与荆山南部余脉结合的山区地带，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湖北省当阳市庙前镇前岗村、烟集村与旭光村。遗址群所在的九里岗为自然岗地，北至庙前镇、南至胡家咀，由一条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长约4.5公里的主岗及其延展的众支岗组成，东部以漳河为界，西、南部紧邻漳河支流瓦窑河，范围达15平方公里，整体地形为西部偏高（丘陵岗地，漳河二级阶地），东部偏低（河漫滩冲积平原），岗地与河漫滩之间还有呈过渡性特征的低岗地（漳河一级阶地），海拔高程40~85米。遗址及墓地均处在一级与二级岗地之上。九里岗遗址群指目前已发现的九里岗遗址、夹口山遗址、平面山遗址、西面山遗址、杨木岗遗址、北木岗遗址、马林岗遗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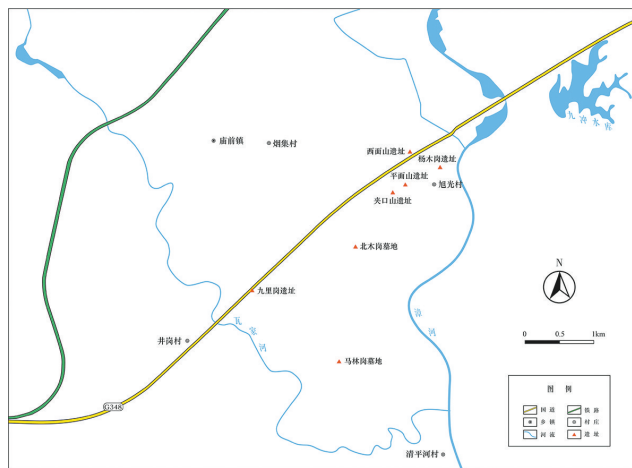
2022年7月至11月，为配合沿江高铁荆门至宜昌段基本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宜昌博物馆、当阳博物馆联合组队，对高铁沿线进行了调查，并对涉建范围内的九里岗遗址、北木岗墓地进行了重点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收获。

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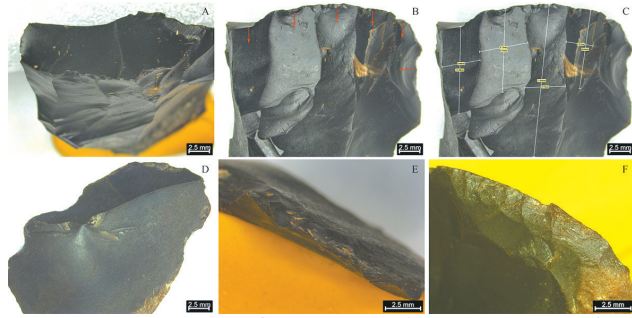
重点调查了九里岗遗址片区和朱家湾遗址片区，现介绍如下：

九里岗片区位于九里岗主岗及东侧，属漳河二级阶地。通过地表踏查及断面观察，确定九里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范围约25万平方米，三处较密集的区域分别命名为第一、二、三地点。其中，第一地点为1996年发掘处，在其东部断坎上采集石制品十余件，器形以小型刮削器为主，另有石核、石片等，石料多为石英岩、变砂岩等；第二地点为2022年发掘处，在发掘区外围的施工破坏断面处采集有以砾石原料打制而成的大型砍砸器、小型刮削器、石核等石制品五十余件；第三地点位于九里岗主岗北缘，在地表采集有砍砸器、石核等石制品数件，其中一件柱状石核上具有清晰的台面预制修理及连续剥离长石片的疤痕迹。

朱家湾片区位于漳河西侧，属漳河一级阶地。除过去并称为朱家湾遗址的平面山、西面山、杨木岗三处外，还包括新发现的夹口山遗址。四处遗址连接成片（大致以冲沟为界），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其中，平面山3万平方米，堆积普遍在2米左右，遗存以大溪文化居多，另有屈家岭文化等。西面山面积14万平方米，堆积厚度0.7~1.5米，遗存以大溪文化为主，另见大量春秋中期遗存，在其周围有一圈环壕。杨木岗以东周时期遗存为主，东周遗存可早至春秋中期，另见汉代及后期遗存。夹口山遗址属于本次调查的重要收获之一。该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地表采集以小石器为主。采集的十余件小石器中7件



九里岗遗址群各遗址位置示意图



夹口山小石器的打制特征及使用痕迹

具有明显的加工或使用痕迹，石料以黑色燧石为主，加工方法为间接打击法及压制法，器形多石核、石片刮削器。细石核为柱状，长径3.6~4.3厘米，厚2.5~3.1厘米，重10.98~35.31克，其中一件存在清晰的预制修理台面及多处连续剥片留下的片疤，剥片宽2.87~5.72毫米，长径9.24~17.82毫米，两侧边近平行，具有细石叶锥形。石片刮削器多扇形，长径1.9~2.7厘米，厚0.4~0.6厘米，重1.22~3.18克，部分刮削器刃部具有两面交互修理的特征，见明显的鱼鳞状或不规则状使用痕迹。另在遗址东部还采集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多属后石家河文化。东部堰塘的剖面显示，该处地层堆积从上至下分别为表土层（①层）、黑色层（②层）、深褐色层（③层）、浅褐色层（④层），②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③、④两层为更新世晚期，小石器出土于第④层。

除上述两大片区外，岗地上多见历史时期的墓地及封土冢。墓地除已知的九里岗、马林岗墓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

期）以外，还包括本次于线路北侧勘探发现的北木岗墓地（东周时期，当属于杨木岗东周聚落的一部分）。另外，高出地面的封土冢散布于岗地之上，直径多在二十米左右，较为集中分布的有洪家冢群。限于勘探范围有限，实际墓地数量还应更多、墓群面积还应更广。

发掘

本次仅发掘了九里岗遗址与北木岗墓地。九里岗遗址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发掘区域内晚更新世地层之上有厚达1~3米的近现代堆积，已发掘的晚更新世地层由上至下可分七层（第②至⑧层），除第⑧层以外，第②至⑦层均出土有石器，其中又以第⑥层出土的石器最为丰富（可能为小型石器加工场）。共出土石制品三百余件，类型有手镐、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石核、石片、断块、石渣等，打制技术以锤击和砸击为主，石料多为采自河滩的块状砾石，岩性主要为黄褐色、白色石英岩，占总数的75%以上，次为黑色硅质岩，另有少量黄色砂岩、白色脉石英等。年代从旧石器时代中期一直延续至晚期。九里岗处于山前岗地，是早期人类从洞穴走向平原的过渡性遗存。

北木岗墓地位于朱家湾遗址西南1.5公里处。布方2000余平方米，发掘了23座竖穴土坑墓和3座车马坑。土坑墓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除小型墓葬以外，大、中型墓葬均带有东向的墓道。三座大型墓位于东侧，在其西侧均陪葬有两马一车的车马坑，其中一个车马坑（K3）还有殉狗的现象。根据出土器物，可大致推测墓地年代在春秋战国之际。根据墓葬数量及规律性分布特征，推测应为一小型家族墓地，且与杨木岗遗址关系密切，属于东周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

价值与意义

九里岗遗址群自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至魏晋南北朝，其中尤以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周代的堆积最为丰厚，学术价值最为显著，是探索沮漳河流域乃至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及早期楚文化的前沿重地。

填补了江汉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的缺环。这里主要指大约在距今1.8万年更新世末次冰期盛冰期前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或称“中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属于这一阶段的人类活动遗存极其稀有，目前除漳阳平原在极少数遗址发现有稀薄的地层堆积及少量的遗物外，江汉平原尚未发现这一阶段的遗址。夹口山遗址通过地表采集及清

理断坎剖面发现了具有原生地层的小石器，其以结构致密的黑色燧石为主要原料，器形较九里岗遗址更为细小，且留有清晰的间接打击法及压制法的片疤痕迹，反映了当时的人类为适应生态环境变化，而在生产生活上对劳动工具有了新需求。随之而来的是石器加工技术上的重大进步，这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崭露头角的复合工具在旧—新石器过渡阶段得以长足发展的有力证据。夹口山遗址为构建沮漳河流域史前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材料，也为深入了解长江中游地区旧石器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人地关系、石器加工技术、生产模式等方面的发展层次及演变脉络等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夯实长江中游早期文明探源的实证基础。进入一万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的文化重心经历了由涪阳平原到汉西平原再到汉东平原，并最终汇入到以中原为主导的华夏文明进程之中四个大的发展阶段。大溪文化及其所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复杂化程度，表明距今六千年左右的一个时段是长江中游迈入五千年文明史的前奏与关键。从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影响区域及发展态势来看，该文化的中心区域既非峡江地区，也非涪阳平原，而在江汉平原西部一片，具体说来，当在沮漳河及其附近地区。位于漳河旁的九里岗遗址群有平面山、西面山、杨木岗等遗址连接成片，分布较广，以大溪文化的遗存为主，且出现了环壕，是目前已发现的大溪文化遗址中面积最大、堆积最厚、等级最高的一处，当属大溪文化中心。对史前文明形成之初的大溪文化中心的九里岗遗址群开展持续的发掘、研究，确认遗址的规模、等级，进而认识大溪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可进一步夯实区域文明探源的实证基础。

揭示人类社会从文化向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九里岗遗址群的基本特征首推“延续性”，在同一条岗地之上，从十多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间几乎未曾中断，且分布很广，这在早期遗址中实属罕见。其中尤以旧石器时代、旧—新石器过渡时期、新石器时代、周代的遗存最为丰厚。四个阶段的遗存在空间分布上也有规律可循，简单说来，自西向东，处于二级阶地的九里岗遗址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处于一级阶地的夹口山遗址以旧—新石器过渡阶段为主，平面山和西面山遗址以新石器时代堆积为主，另西面山有大量的春秋中期堆积，战国及汉代遗存主要见于最东部的杨木岗遗址。由此可见，自旧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汉代，九里岗地区人类活动的重心有从西向东、从高到低，不断接近漳河水域的趋势，见证了人类社会不断利用、改造及适应自然环境的一般规律。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宜昌博物馆 当阳博物馆 执笔：向其芳 钟倩 余朝婷）

河北邱县首现“马蹄形”唐墓

2023年4月至5月，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邱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对邱县城市综合体工地发现的古墓群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区位于邱县东部振兴路北、人和大街以东“城市综合体项目”规划地下车库基槽，距现地表6米余。发掘面积375平方米，布设探方2个，清理7座唐代墓葬，出土文物20件/组。

这批墓葬均为砖室墓，虽墓顶已毁，但墓葬形制结构保存较好，是一批难得的唐代砖室墓实物资料。这批墓都是先挖出竖穴土圜，然后用砖或瓦砌筑墓室。根据墓室形状的不同，可分为马蹄形、圆形和棺形三种，其中M1、M2、M3墓室为北宽南窄的马蹄形，M4、M5、M6的墓室为圆形，M7为无墓道的棺形砖墓。这7座墓开口距现地表6.44~6.7米，上部地层多为淤积形成。分布相对集中，分为两组，探方T1内3座（M1~M3），探方T2内4座（M4~M7），两个探方相距11米，属两处小型家族墓地。

3座马蹄形墓方向和形制规模近似，墓道位于墓室南端，短且窄，墓壁倾斜无加工痕迹，底部有三或四个台阶。如M1墓道长1.8米，口宽0.54~0.74米，深0.3~1.5米。封门砖位于墓道北端，呈“人”字形砌筑封堵。甬道较陡，顶为一券一伏式，顶上有两或三层平砖作额墙，两壁为条砖错缝平砌。墓室平面呈马蹄形，北宽南窄，四角圆弧，墓壁用条砖或板瓦砌筑，自底部向上逐层内收，墓室内有凹字形棺床，表面铺砖，棺床前地面与甬道底平齐，无铺地砖。M2室内南北长1.9、南宽1.26、北宽2.30米，砖墙底部紧贴棺床的部分用板瓦立砌，其上用条砖顺向错缝平砌，距棺床高0.7米处砌出一圈牙砖，其上券顶内收严重，应为穹窿顶。东壁中部偏南有直棂窗，西壁偏南距棺床高0.8米嵌有一个青瓷灯盏。3座墓皆为合葬，无葬具，人骨2~3具，头向大多朝西，多为迁葬。随葬器物多位于棺床西南部，器物组合为红陶罐、瓷碗和铁釜斗。

3座圆形墓规模较大，盗坑破坏严重。墓道位于墓室南端，较长较宽，墓壁略倾斜内收，底部有台阶。封门砖位于墓道北端，平砌成“人”字形，略向外凸起呈弧形，高、宽均超过墓门。墓门为仿木门楼结构，上部高出开口地表，下部正中为拱券门洞，门洞上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凸出的方形砖雕门簪，两侧用抹角立砖砌出立柱。墓室为圆形，砖墙用单砖顺向错缝平砌，自底部逐层内收，顶应是穹窿顶，底部为凹字形棺床。M4墓室仿木结构较丰富，四根砖雕倚柱把墓室均分为四部分，倚柱底部垫一平砖作柱础，其上用四块抹角立砖逐层错缝砌筑，柱头为一斗三升式，高1.34米。东壁中部有砖雕椅子和捶丸杆，北壁中部有假门和破子槓窗，西壁中部有灯架。该墓人骨散乱发现于墓室填土内，棺床上发现一块墓志，根据墓志记载，该墓为刘氏夫人与其夫某君的合葬墓，于“口通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窆于先域之后”，其后有“大中十四载”，推测该墓时代为咸通八年（867年），北侧的M5、M6为该家族先葬之墓，且M5、M6墓壁东侧亦有仿木砖雕椅子和捶丸杆，西侧有灯架。在相同位置装饰相同砖雕结构，此亦是家族墓的证据之一。此三座墓盗扰严重，随葬品极少，仅M5墓底未被破坏，内有5具人骨，无葬具，头朝南，出土有铜钱4枚、漆器4个、白瓷碗1个，白瓷碗底有墨书“和尚”二字。

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和随葬器物特征，与邯郸城区唐墓、冀中地区唐墓相比较，这7座墓均属唐代中晚期，马蹄形墓时代早于圆形墓。马蹄形墓室造型在唐代墓葬形制中属于少数，零星见于河北中部，在冀南地区尚是首次发现，且砖瓦混筑的建造工艺也十分少见，极有地域特色。圆形砖室墓是隋唐时期河北道及山东的地方特产，规模较其他类



发掘区



M5白瓷碗底部墨书



M2



M4北壁假门和破子槓窗

型的墓要大，墓主身份通常较高，但唐代晚期庶人亦有使用此种墓葬形制。圆形墓多见于河北中北部，占比较大，由北向南逐渐减少，时代渐晚。邯郸地区唐代圆形墓此前见于报道的只有何弘敬墓和鸡泽唐墓两座，此次发现的三座圆形墓实属重要发现。且仿木结构的墓室，是河北地区唐代中晚期的流行做法，为宋辽金时期仿木砖结构砖室墓的盛行创造了条件，是丧葬习俗向世俗化转变的关键节点。

这批墓葬为我们研究冀南地区唐代墓葬分布、形制发展演变和家族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对于研究河北地区唐代不同墓葬形制的使用人群及演变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此外，本区域历史上曾长期遭受水患，地理环境在不断变化，唐代地层在现地表6.4米以下，为研究历史地理演变亦提供了资料。（邯郸文物保护研究所 执笔：刘爽）

江西宜春袁州古城高士南路段城墙遗址考古成果

袁州古城高士南路段城墙遗址，位于江西宜春袁州区平安路附近，是袁州古城南侧城墙的一部分。于2020年6月修建高士南路过程中发现。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宜春市博物馆对其进行初步发掘。

为了展现袁州古城历史风貌、挖掘袁州古城文化内涵，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宜春市文广新旅局、宜春市博物馆等组成联合考古队，在前期考古工作的基础上，于2021年9月至2022年8月，对高士南路段古城墙遗址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此次考古勘探3000平方米，考古发掘900平方米，揭露了夯土包砖城墙墙体、马面和夯土遗迹等古代城墙建筑遗迹。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热释光测年结果，结合文献资料，将揭露的城墙遗迹分为晚唐五代和南宋两期。

晚唐五代时期，共经三次修筑：第一次是在生土上砌筑夯土包砖城墙，残长共计27.20米，残高3.97米，仅见夯土墙芯和南侧包砖墙，二者同砌。其中南侧包砖墙采用青灰砖丁顺平铺，收分较小，红色黏土勾缝，墙体断面呈下大上小的梯形。部分砖有模印“官”字。该包砖墙所用青砖与南京、福州、扬州等地出土的晚唐五代时期的城墙砖具有相似性，经过热释光测年为距今1115±110年。

第二次修筑是在沿用旧有墙体的基础上，增筑了北侧包砖墙。残长51.43米，宽约1.16米，高4.40米，墙体砌筑用青灰砖、红砖、灰白砖丁顺平铺，每层收分2~3厘米，红色黏土勾缝。通过对北侧包砖墙进行热释光测年，为距今1175±120年。第三次修筑或许是因为地面不断抬高，为巩固国防，故对城墙两侧进行增筑。

这一时期的遗迹和地层内出土了少量的青釉瓷器，具有晚唐五代时期风格。如标本2021JYGT0101⑧b:1内底清晰可见圆形支钉痕，具有鲜明的晚唐五代特征；标本2021JYGT0301⑦b:2内外底均可见细小支钉，同类装饰工艺在兰田窑晚唐至北宋早期的地层中均有发现。

南宋时期，除对夯土包砖城墙进行彻底修筑外，还增筑了马面。这一时期的修筑分为两次：第一次修筑时，夯土包砖城墙继续沿用，但对城墙略有整修，同时在城墙南侧修筑包砖马面，揭露残长16.93米，宽5.98米。由同砌的内外夯土和外部包砖墙构成。马面夯土分为四层：①层为红黄两色土间隔夯筑，夯层近平；②层为红色土，夹杂大量碎砖；③层也为红黄两色土间隔夯筑，夯层近平，夯窝为直径5厘米，深0.5厘米，④层为红色土，较为干净，略松散。马面包砖墙由砖叠砌，较多地使用了碎砖。墙体基槽宽1.6~1.7米。内起筑长方形砖框墙，砖框靠近夯土的一侧与夯土紧紧咬合。包砖以灰白砖为主，部分模印带方框的“官”字。还使用了一些破碎的青灰砖，交错叠砌，红泥勾缝，内填碎砖、红土。值得注意的是，遗址还出土一块“建炎二年”纪年砖，质地和大小与马面包砖墙用砖一致。此外，在城墙北侧增筑夯土，采用红黄两色土夯筑，南侧近墙处近水平夯筑，北侧呈斜坡夯筑，斜度为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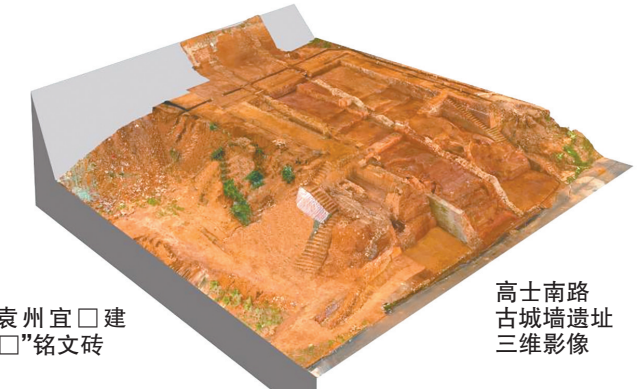
第二次是修筑了南侧的包砖城墙和马面包砖墙。对夯土包砖城墙的修筑采用青灰色砖，质地较坚硬，部分砖长侧面模印“记”字等。马面南侧包砖墙修筑用残砖较为杂乱、破碎，采用丁顺平砌和红泥勾缝。

这一期地层和遗迹中出土了少量吉州窑的白釉、黑釉器和景德镇的青白瓷器，均为南宋时期的瓷器产品。

据文献记载，宜春筑城始于汉高帝六年，初唐开始使用砖



出土“袁州宜口建炎二年”铭文砖



高士南路古城墙遗址三维影像



2021JYGR4c: 1

2021JYGR4c: 2

2021JYGR2: 1



2021JYGR8b: 1

2021JYTD001⑦b: 1

2021JYTD001⑦b: 2

遗址出土晚唐五代瓷器标本



南侧包砖墙“官”字铭文砖

作为建筑材料。宋室南渡，为巩固国防，政府进一步增修袁州城。据方志文献统计，唐代至清代修葺城墙34次。高士南路城墙遗迹是袁州古城重要组成部分，呈现了袁州古城从晚唐五代到南宋时期发展演变过程，是宜春城市发展史的重要例证，展现了袁州古城重要的历史地位，是江西乃至全国城市考古的重要收获。

（宜春市博物馆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叶颢 李兆云 张文江）

科技保护 环境监控、本体监测、预警评估		MicroWise system 元智系统 西安元智系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MicroWise System Co., Ltd.
科学管理 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咨询服务		遗址 博物馆 发掘现场
创新服务 科技文创、定位导览、数字化采集		档案馆 图书馆 旅游景区
官方网站	官方微信	联系人：张总 13572270596 座机：029-88346362 官网：www.microwise-system.com 邮箱：info@microwise-system.com